

GAO CENG REN WU ZI SHU

高层人物



自述

中国古籍出版社

高层人物自述

主编 孙小金

第五卷

中国古籍出版社

中国托派王凡西自述

五四与五卅

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我正在本乡小学里读书，十二岁。但知道有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却又在一二年之后了。

我的故乡是这样的一个市镇，它是既开通而又闭塞，不偏僻却是荒寂的。地处于沪杭之间，有铁路线联络这两大都市。它是浙西的两个食米集散地之一；更有不小一个区域的农民的蚕丝，由这里收购了送去上海。所以商业资本很早统治了这个地方，商人久已是它最有权势的人物。读书人，据说在清朝就是如此的，如果他不同时又是典当主人、钱庄老板或大地主之类，一样不为人重视。这里的传统是铜臭压倒书香，文化气息自来稀薄得可怜。

上海市场的消息，几小时内就可以在乡镇的茶馆里引起风波；而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

在人口将近三万的市镇里，只有两所完全小学。我所就读的那一所，因为由一位富有的孝廉公当校长，教员中的多数也是地方上有地位的绅士，所以被视为最高学府。孝廉公以他办书院的方式来办“洋学堂”。大堂上供着“大成至圣先师”的神位，受着孩子们晨进夕退的两次敬礼。功课中虽已有了格致、音乐，甚至高年级还教英文，但最注重的还是国文，尤其是《论语》和双山回忆录《孟子》。我只读过《论语》，由一位儒医两通的老秀才给讲解的，教得很认真，要求非常苛刻，甚至连朱夫子的注释都得背。

关闭在这样的门墙里，外面世界发生的思想的激荡，自然不会立即波及的。

然而，要来的终于要来的。大约在一二年后，它由上面和外面侵进来了。

县里的视学员，也是本镇上一个秀才，想夺取这所最高学府。他靠了一个与孝廉公们敌对的大绅士撑腰，又借了点县教育局的势力，推倒了老校长。这一来，颇不得大多数地方人士的同情，因此当他以新校长资格走马到任时，非但旧教员无一留职，而且镇上的所有读书人都给了他抵制，不受他的延聘。结果他只好求才他乡，请了一批杭州第一师范刚毕业的学生来做我们的先生。

杭州第一师范是浙江省里的“北京大学”。在当时，它与长沙的第一师范，可说是北京大学新思想运动在外省的两个最得力的传播站。校长经亨颐，气度与为人跟蔡元培相似。于学派无成见，对人才兼容。自己的思想是开明而民主的。他所延致的教师中有所谓“四大金刚”（陈望道、刘大白等），学生中出名的是施存统、杨贤江等辈。施存统（后来改名复亮）之出名因为写了《非孝》那篇文章，而《非孝》又使第一师范大大出了名。

当时浙江省的统治者（督军卢永祥，省长张载扬，警察厅长夏超）早把第一师范看成眼中钉。久矣乎要给他一点打击，苦于没有借口。《非孝》（登载在第一师范学生自办的一份刊物上的）一出，便有了题目，当局对学校进行了迫害。经亨颐为了保护他的教员和学生，以去就争，终于辞职而去。后来学生们为了挽留校长，反对新校长，进行了罢课斗争。最后集体被军警围困在操场上，坚持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抗争。

我们新校长延聘来的新教员中，有一位就是那次斗争的领袖之一，其余的当然也是新派人物。

其时我是毕业班的学生，我们一班的主任就是那位杭州学生运动的英雄。

不过当那一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却以惭愧的心情走进大门的。因为有不少“不事二主”的学生退了学。他们转入旧时三年级主任（一位举人）所办的私塾去就学。留下来的学生大多比较贫寒，他们的家长与学校的旧主持人较少关系或全无关系。“最高学府”的名誉从此毁了，合镇的上流人都鄙视它。就读该校的学生也不再有什么光彩了。

开学典礼时，不见了“至圣先师”，因此也不再隆重鞠躬。四五个新先生，年纪都只比我们大上十几岁的，穿着布大褂，怪不神气。孝廉公时代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派是没有了，我们这些不得已做了“贰臣”的孩子们心里都感觉得有点难堪。

看看课程表，“经学”已经不见了；领来了新书，其中竟有用钢笔板自印的白话文讲义。新的校歌也贴出来了，过去校长引以自傲的那首“论文师轼辙，立品继程朱”的歌词，被宣布作废，改填的是些白话字句。孩子们没有说什么，但不少人想起了镇上流行的批评，“这个学校给弄得不成样子了”。

我们是用失望和疑虑心情来迎接这几位五四运动的代表们的。不过事情改变得很快。不出一二个月，我们就非常崇拜我们的新先生了。首先，我们不必像孝廉公时代那样害怕老师，师生之间成了朋友；其次，我们完全懂得他们所教的东西。陈独秀胡适之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文，周作人的小品，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我们都贪婪地，怀着无上兴趣地读着。（顺带说一说，那时老师们始终没有将鲁迅的东西介绍给我们，甚至我们不曾听过提他的名字。我个人知道鲁迅与阅读他的作品，那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的事。）尤其叫我们欢喜的，乃是听他们讲自己在杭州闹风潮的故事，讲他们的学生生活。不久，新方式的学生活动就在我们学校里试办起来；成立了自治会，创建图书馆，订阅沪杭日报及杂志，办了手写的粘贴在墙壁上的校刊，甚至还开了一间学校商店。

不消一个学期，“最高学府”的面目和气氛已改得完全不同了，它变成我们小镇博士的“北京大学”和“第一师范”。在本地卫道夫子们的心目中，我们都成了陈胡新党的小喽啰，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十四岁那年我在小学毕业。为了前途问题，我和那时候的许多孩子一样，和父亲发生了冲突。我的父亲是一个读书人，前清末年进了学的，所以他有资格与士大夫游；但因他不是富家子，地位当然不高，虽在诗酒唱酬中，也不免常要受些闲气。这就养成了他的两重性格：一方面看不起那些似儒实商的绅士；另一方面却决心要在商业上竞胜致富。他时常用了愤世嫉俗的口吻（多半在他醉酒以后）对我和我的兄弟说：“读书人最

没有出息，有了钱人家就会敬重你。”因此，当我读完小学之后（当时照我们乡间人的说法，这程度已等于前清的秀才），他坚决要我学生意，不让升学了。他这样决定，另一原因是家境不好，实在也无法供给我上省城读书的费用。所以在我毕业前半年，他老人家就已托人在上海一家洋行里替我说好了练习生的位置。

可是我的想法和志愿与父亲的大不相同。我生来也许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小时候当然更不会看重实际。最欢喜读《水浒》，也欢喜《三国志》。侠客和义士乃是我心灵里最早的偶像。在家人中，我最崇拜我的叔祖，他是一个武秀才，绰号“大刀”，性情真直，虽老不失童心，平生不事生产，以致为家人所贱视。而我却非常欢喜和他在一起，听他讲快人快事，常使我寝食俱废。叔祖爱谈他自己的父亲（即我的曾祖），说他曾经帮“长毛”（太平军）打仗，离家三年，转战皖省，一直到清军攻陷南京后才偷偷回家的。家里长辈谁都不愿意提起这件事，而我也把他想像成了英雄，将他和《水浒》《三国》中的人物联结起来。

经过一年多五四精神的熏陶，我的兴趣和思想都发生了不少变化。当然，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谈不上什么固定兴趣与系统思想。所谓变，也只是模糊的方向而已。在未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前，我们这些孩子简直没有精神生活的，浑浑噩噩的。拿我个人来说吧，除了演义小说里的人物引起我一些奇异的空想之外，更不会想到比饮食游玩更多的事。而新影响却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打开许多窗，让我们由那里看见许多未曾前见的境界，尝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乐趣，以致引发了对远大事物的憧憬和向往。孩子们的志向与天地扩展得如此之快，竟致远远远地超过了父兄们所能了解的程度。我们的小眼再不注视在一家门的楣上，不以一乡一镇中的荣辱为怀。我们（决非我一人如此，同学中不少人都是一样）居然“以天下为己任”，将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思想家、文艺家为做人的典范了。总之，五四精神使我们变成了染上时代狂疾的小志士，变成了好高务远的理想家。在我个人，旧日的侠义偶像和新认识的崇高的心智活动家结合起来了，而后者又逐渐地代替着前者。

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我之无法接受父亲给我安排好的前途，乃是十分自然的。父亲方面呢，他根本不曾想到他的“小东西”自己竟已有了主意。他是我们家中的绝对君主，连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在内，都对他非常畏惧的，我当然更加怕他。平时他不苟言笑，对家人从来不和颜悦色地谈句天，只有当他喝醉了而又非泥醉的时候，才透露出一点人情的暖气，卸下了他家长的严肃面具。此时的我，尤其是我的姊姊，才会沾着点父爱：听些并非训斥的牢骚，尝尝他带回来的糕点。

我将到上海去学生意的决定，也就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晚上被通知的。那天晚上父亲特别高兴，记得还从一家宵夜馆里叫了炒面回来。他相当庄重地通知了我这件事情，同时讲述了他如何请托亲友帮忙谋得了这个位置的经过，又说将来补读英文的夜校也托人找好了，他要我好好去做，洋行出路是很大的。父亲的通知原不需要我同意，他说过就算，接着就宣布要吃炒面了，而我此时却不知从那里来的勇气，竟敢当面对他说：“我不做生意，我要到杭州去读书。”情势当然急转直下了，在座的母亲和姊姊都吓呆了，拿起了的筷子又悄悄地放下，她们以万分惶恐的眼光望着我，我则把眼睛望着地板，不

敢看父亲的神情。父亲的决定被人违拗，在这家里大概还是第一次；而这一次竟出于他最小的儿子，一定使他感到十分意外的。所以他的愤怒竟不以惯常的方式发泄出来，没有呵斥，没有敲打，只是气得连声都出不得了。

父子间的关系僵持了两个月，结果却以折中的方式和解了：答允升学，但必须读商科。因此我考进了杭州的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这个学校与第一师范相连，校舍都是前清的贡院。两校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身在墙东而心在墙西。商科的功课引不起我丝毫兴趣，尤其叫我头痛的是簿记、珠算与辨币。这个学校的环境十分庸俗，学生活动全无，文化生活贫乏之极。它比孝廉公时代的我们的小学还要死气沉沉。呼吸了一年多五四空气的我，简直要在这里窒息了。那时我对学问的兴趣是尚未固定的，择业的问题并不困扰我，我所欢喜的只是一般的学问，一般的知识，特别是新的。所以凡是新书，不管是文学、哲学、科学，我一视同仁地拿来读。无钱买书，星期天就跑到书店里去翻，或到西湖图书馆去借阅。这些书多半是不易懂的，有的是真的艰深，有的则为了天书式的翻译；可是我直着脖子吞下去，不管它们能否消化。在商业学校里混了两年，那枝簿记棍如何使用都不曾学会，而从杜威、罗素、柏格森到泰戈尔，乃至古代学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的大名，却已经知道了一大串，甚至有不少他们的中文译作都被我翻过了。商业和我的兴趣之间也就愈离愈远，再耽下去简直是苦刑了。

在第二年的第二个学期中，学校闹了风潮，我被推为代表之一。结果风潮胜利，学生代表却全被开除。我原是被开除者之一，只因校中的一位国文教员是我父亲的朋友，为我力保，总算“顾全面子”，私下教我“自动转学”。这次事情没有使父亲气恼，很乐意地让我转入了一个私立的普通中学，从此我跟商业最后地作别了。

一年后父亲逝世。再过一年，临到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期，“五卅”运动爆发，那时我十八岁。

“五卅”以前的二年中，我仍旧是漫无目标地乱读书。不过由于创造社的影响，兴趣却渐渐转趋于文学方面。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我成了创造社诸作家的崇拜者，个人则尤其欢喜郁达夫，在有意无意中，深受了他浪漫的颓唐的影响。同时也因为父亲故世，家道日窘的关系，更加以“沉沦”式的不幸青年自命了。同学中也有人欢喜写作的，教员中也有一二个新人物。因此在“五卅”运动的半年前，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出版了一张报纸，报名竟莫名其妙地称为《赤报》。其实当时我们的思想离“赤”尚远。内容也根本不属于此一色彩。记得此报的一篇主要文章，是我从一本英文哲学史（只记得是“家庭大学丛书”之一，著者为谁都已忘记了。）上译出来的序言。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固定思想，基本的政治倾向只能说是民族主义。但是报名吓坏了人，所以只出一期，就让校长禁止了。

那时候的杭州，真正的赤色思想原已存在。《向导》报的公开通讯处是杭州法政专科学校。收信人安存真，即该校教员安体诚（一九二七年为蒋介石杀于龙华），是出名的共产党员。我的几个乡前辈在杭州搞国民党（实则共产党）。SY也有了，第一师范里有一点组织，我的自小朋友许志行就是那个组织的负责人。我和他们之间常有来往，

但我没有加入。原因是：那时我看不起干政治活动的人。为学问而学问的观念给我的影响很深；我觉得干政治根本不是做学问，两者是背道而驰的，而我则一心要研究学问。我们的中学里也有一两个人入了“国民党”，他们很活动，很自负，可是功课很糟糕，这件事又加强了 my 成见。

其实我那种想法，本质上只是反映了当时新思想运动主流的分化。我是在“五四”之后一两年才接触到五四思想的，等到我追上它、接受它的时候，新思想的本身却早已向前进展，发生变化了。《新青年》分了家，陈独秀与胡适之各走各的；前者前进至马克思主义；后者则仍旧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段上。前者由思想而进入行动，由文学革命而政治革命；后者则欲保持思想的“纯洁”，反对文人玩弄“龌龊的政治”。由于行动的需要，陈独秀与李达等组织了共产党，与南方的孙中山结了同盟；此时胡适之等却贯彻其“学者作风”，与梁任公的研究系合作，同时寄托希望于北洋军阀的政府。

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此种分合情形，我是茫然无知。杭州虽说是一个省会，北京新出的杂志也多少能够看到，但一般说总是落后得很。那里的多数教员与学生，如果算得上“新人物”的话，多半以新到接受“五四精神”为止。对于“德”、“赛”（民主与科学）二先生的向背，对于孔子的抨击或崇拜，始终还是这个城里新旧人物的分界线。因此在无形中，杭州被五四运动唤起了思想生活的青年们，就当时思想主流的分派说，都属于胡适之方面，亦即属于梁任公方一面。他们对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分子”，虽然不是仇恨的，却是轻视的，因为这些人“不忠实于学问”，却去搞政客勾当。

在一九二五年春天以前，我也是这样一个不自觉的“胡适之派”。“五卅”运动却给了我一个激烈的与决定性的转变。

上海爆发惨案的时候，我们正忙于毕业考试。在最初，我们简直不甚留意这件事情的。后来看见它愈演愈烈，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工人罢工，掀起了前所未见的大风潮，我们这才开始激动起来，觉得我们也必须有所表示，才能对得起上海同学。学校里的空气热了起来，学生中沸沸扬扬着，校与校间开始了联络，人人都感觉到非干点儿什么不可了。大概是惨案之后的三四天吧，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到了杭州，向各校学生报告惨案经过；杭州的学生立即行动，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成立杭州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我因为平时曾参加演讲比赛，而且在校际竞赛会上得过奖，同学们就以为我具备代表资格，推举了我，另一代表便是我上面提过的那个“国民党分子”。应该承认，我最初去当代表是不太愿意的，原因是上述的成见作怪，这些是风头主义者干的玩意儿。在第一次的成立大会上，我意外地又被人推举成宣传部长，这使我惶恐起来，我心想：糟糕；毕业考试完了，大学也不必想考了。可是这种不愿意与惶恐的心理出现得极其短暂。工作一开始，斗争随着爆发而日趋紧张，我以全心身投进这个新的活动中心，毕业与升学等等都被置诸脑后了。

参加杭州学生会工作大约只有三个月，从六月初起，直到八月底离杭赴京去考大学为止。这一段工作对我的思想与生活却发生了很大影响。简单地讲，它使我脱离了胡适

之而走向了陈独秀。这三个月间没有读什么书，整天忙的是工作，然所得益，套句现成的话说，真是“胜读十年书”。大时代中炽烈的大斗争，像只巨大的熔炉一样，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适的思想和感情焚化于俄顷之间，同时将你含有的（如果有的话）某些较好的东西提炼出来。一个省会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当那个时候，无论就深度与广度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因被配置在大时代的背景上，作为全国性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一部分而出现，其意义亦自不同。对于像我初次跨入思想生活的年轻人，其意义竟是决定性的。我很快懂得了，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说法是多么地虚伪；真正学问应该和行动相结合，为行动服务的。我懂得了，做学问与“干政治”绝非对立的；而政治上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们，根本无法做纯粹的学问，他们的学问应该集中于一门，就是如何为改变这个地位而斗争。这点道理一半是我在工作中悟出来，另一半则由于和那些平素为我所鄙视的“风头主义者”的接触和接近，我发现他们中多数不但比我能干，而且比我有学问。我几年来的自以为追求的“真正学问”——乱七八糟地阅读杜威、罗素以至柏格森等辈的大作，这时却被证明出非常无知与混乱的。这时我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那两位“搞国民党”的乡前辈手里看到一些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觉得这是一种切实而有用的学问，与我先前所学的一些不同。

在杭州的短期工作中，我获得了一个终生受用的认识，那就是：对外斗争与对内斗争不能分开，而且后者胜利乃是前者胜利的条件。记得在学生联合会的第一次大会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杭州学生应与上海同学一致行动，实行罢课？代表们的意见是分裂的。一部分认为这是对外斗争，是反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我们不应该罢课，因为罢课这种手段只能用以对内斗争，譬如反对学校当局的黑暗或政府当局的腐败之类。杭州学生罢了课来反对上海租界上的英国人，据这班代表的意见，近乎“无的放矢”。“人家不会理你们的，荒废学习是你们自己的事”，他们说，“为了真正能够反对帝国主义，我们非但不应该罢课，而且应该加紧上课，加紧学业来武装自己”，这些人说得颇有道理。另一方面，多半是有了若干政治背景的代表们，则坚决主张罢课。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罢课，什么行动都谈不上，一切所谓反对都是空谈。我是主张罢课的。但心里却觉得前一理由充分；赞成罢课，只是为了行动罢了。结果以微小的多数通过罢课。

杭州学生就这样行动起来了。全体学生组成了数百个小队，到戏院、茶馆、公园、以及马路旁边去作鼓动演讲。动员很彻底，连杭州最保守的女校学生都出来了。我们原想让那里的商店都罢市，但没有成功。杭州学运中空前规模的一次示威举行了，参加的约有七八千人，包括小学生和若干市民在内。当时浙江的督军是孙传芳，一个非常狡猾的北洋军阀。在全国热烈的战斗空气中，他不敢正面来压迫我们，他表示“同情”。当游行示威时，他派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兵士来“保护”我们。他还召见了学生代表，发表他“爱国不敢后人”的鬼话，要我们把外交重任信托给当政的人，安心读书。

我们，至少像我那样的十几岁的孩子们，并非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阴险。可是渐渐地，我们感受到他暗中活动的影响了。有一个学校，仿佛记得是体专，由于那校长与省当局的特殊关系之故，首先对联合会采取了一些古怪的行动。后来，在我就读的那个学

校里，一位最热心赞成学生运动的教员被解了职，我这个代表也间接受到警告。不发给毕业证书的威吓都听到了……

在我工作的那三个月中，更露骨的镇压行动虽然不曾见做出来，但是种种的无理阻难，却已足够给了我一个清楚认识，对外斗争与对内斗争是分不开的，真正的反帝斗争只有通过对内的革命斗争。

当我交代了学生会工作，离杭赴京的时候，胡适之、梁任公思想已经从我的头脑中彻底廓清，完全站稳了左派陈独秀立场了，虽然在形式上我还不曾加入共产党。

二年大学生活

中学毕业，和小学毕业时候的情形不同，没有人为我规定前途了。父亲已故世一年多，我是充分自由的；但经济条件限制着我，家中境况更不如前。父亲于久病之后逝世，比我仅长六岁的大哥挑起了一家重担。大哥小时候不大爱读书，很早就帮助父亲经商。我家在父亲病中及其死亡前后所遭遇到的种种经济困难，都是这个二十余岁的年轻人去应付了的。在我们那个铜臭熏天的小镇里，他为此自然受够了屈辱，深深体会了人情和世态。他常怀不平，牢骚满腹，立志要中兴我们的家，要为抑郁而死的父亲吐一口气。

我在中学毕业后，大哥赞成我去投考大学，他答应竭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我，希望我能够和他殊途同归，从商学两方面去光大门楣，为亡父争气。

大哥的态度并非丝毫不曾感动我。我虽然不像他一样地直接挑着家庭担子，也很少和他一样地亲自尝到亲友们冷酷的待遇；但我是间接受了一些的，当然分担着他的感情。我仇视所有在我家苦难中不予援手反加践踏的势利人。特别使我气愤的因而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其一，父亲卧病那年，我们借住在孝廉公（即小学旧校长）的兄弟的一所房子里。此人原本也是父亲朋友，平时颇有来往，谁知父亲病危，他竟来借故逼迁。另一件也是我亲眼见到的：父亲刚故世，停柩在堂，从来替父亲经营小工厂的那个本家，却宣布辞职，自己要去开一间同样的工厂了。因为自来对外的一切关系都操在他手里，他这“独立”就无异宣布我们完蛋。大哥气得发抖，我母亲于哀求无效后在灵前痛哭，而这位本家却耀武扬威地走了，我恨不得将他一刀杀死。

这些事在我幼稚的心里留下深刻印象。兄弟俩抱着同仇敌忾是十分自然的。中学里我读书相当用功；而在用功的诸般动机之中，显然有“报家仇”一项在内。

中学的毕业班中，连我在内，共有五人要到北京去。临行前，大哥与母亲想尽办法，替我筹措了五十块现洋。那时从我乡到北京的三等火车联票就要将近二十元，所以余下来只有三十元左右了。到北京后的生活怎么办，那时候我简直根本不曾想到。四位同行者由杭州动身，我在中途的火车上会合他们。大哥送我出远门，同坐了一段车。火车上自然不曾说什么话，他只是向我的同伴们致意，要他们多多照拂。车到嘉兴，他落了车，在车窗外嘱咐些十分琐碎的事情。车开了，他伫立在夕阳中，久久注视着探身窗外的我。他那种殷殷期待的眼光唤起了我一种悲壮情绪，仿佛我是以重振家声的共同战士开上前线去的。

然而，我这个做弟弟的丝毫不曾满足了大哥的期望。时间流去，世事多变，兄弟俩的人生观愈离愈远。在多次失望之后，他对我的手足之情也变得非常冷淡了。

多年的想望终于实现，我考进了北京大学。心情的愉快激动，大概和一个虔诚的教徒走进了有名的圣堂差不多。北大那时已经不是“五四”当年的旧样子了，蔡元培挂冠而去，陈独秀早就离开北京，以全力从事共产党工作，胡适之据说与校中的国民党系教授（李石曾、顾孟余等）闹意见，告了长假，在上海养病著书。可是校中还有不少我所崇拜的教授留着，又有那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号房里出售的各色各样期刊，也引起了莫大兴趣。这里不仅让我看到了一个所谓学府的规模，它的壮丽的形相，而且也让我呼吸到了学问的空气，一种文化的气息，它让我们仿佛捉摸到了民族、时代，乃至世界进展的脉搏。此种崇敬与兴奋的心情，在当时从全国各地远道前来的年轻求知者中，一定是很普遍的。

北京当时的政治情势颇不稳定，在不稳定中急剧地向左倾斜。一次奉直军阀的混战因冯玉祥的“倒戈”而结束；溥仪在紫禁城里的傀儡朝廷给扫去了；因孙中山的死，在古城里造成的政治生活还在激荡；南方相继发生的“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以及使世界震惊的省港大罢工，又使这种生活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不断地提高着，加紧着。段祺瑞的政权是依靠在几个军事势力相持上的一座空架子，它自身全无力量，作恶作善都谈不上，这使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的分合更加自由和顺畅。

以思想论，掌当时实权的各系北洋军阀都是死的。其直属政客们所草拟和发表的“反对赤化”大论，荒谬愚蠢，看了叫人会笑落大牙。他们在青年人中没有直接支持的。但是间接地，通过了梁任公的研究系和胡适之一班名流，却能在青年中找到对他们的容忍和幻想。梁任公那种要改良不要革命，胡适之关于“好人政府”的胡说，在学生群中并非毫无影响。至于他们那种反对革命的消极的防阻性的战略，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口号，对学生的影响当然更大。另一方面是左的，当时是模糊地代表着国民党（实则是共产党）的思想。这个左派的影响比较广大（那是由于全国的斗争形势正处于革命前夜之故），但立场反不及右边明确，思想也没有梁、胡他们的深刻。这现象今天在事后回想，大概左方大将云集南方是原因之一，而国共关系混淆不清，共产党本身的理论尚未臻充实，也许是另一原因吧。

代表着上述两种倾向的，在我刚到北京时候是晨报和京报，尤其是二报的副刊。此外还有胡适之、陈西滢们的《现代评论》与周作人和鲁迅等人的《语丝》，也多少代表两个对立的流派。

这些副刊和期刊都是偏重文艺的，很少讨论到严重的思想问题或政治问题。有时候争论点非常琐碎，譬如进行于鲁迅和陈西滢之间的笔战，牵涉的竟往往是些“私事”，但它们在当时青年中所引起的关心却不下于军国大事。其影响也决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辩论所发生者为小。人们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前进和倒退，非正统和正统，革命和保守。在这方面，凭我的个人经验说，周氏兄弟的作用极大，其功绩不容忽视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在当时他们固然未曾走到、即使到后来也不曾走到共产主义。

《猛进》周刊，北大教授徐炳堃所编，政治性较浓，左的立场也较为鲜明，但影响不大，销路远不及《语丝》和《现代评论》。另外还有些纯文艺的刊物，如《莽原》

之类，不过流量及其思想的影响力都是差得远了。

所有这些刊物，都强力地吸引住了我们这些新来北京的年轻人。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期刊物的出版。买到了新刊，总是细心地把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读进去，其用功程度，一与读校中功课的情形无法比拟。

我对文艺的爱好那时可说到了极点。不久之后，我居然从这些刊物的读者变为投稿者了（最初投《现代评论》，后来改投《语丝》）。看见自己的名字和从来敬佩的作家排在一起，开始自是非常欢喜的。不过这种心情继续得并不长久。为了生活艰难，我很早就不得不给其他的有稿酬的日报副刊（《语丝》与《现代评论》都不给稿费）经常写些东西，因之很快就感觉到了卖文之苦。做文丐的卑屈感，毋须多少时候，就驱散了我做“作家”的虚荣。

不过没有使我变成作家的更大原因，乃是进校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紧张的地下革命工作根本不让我有时间去再“弄”文学；同时生活的巨大转变，随着也改变了兴趣；等到一九二六年寒假之后，我非但极少再写文艺性的东西，甚至连文学的书籍都不阅读了，虽然我选读的始终是大学里的文科。

名义上我读了两年大学；但实际上课的钟点，合计起来不到一整年。真正用功读书的，那恐怕还只是最初的半年，即当我最热衷于文学的那段时间。当时新交的朋友，大多也是爱好此道的。一同赴京的几个老同学，因为并不考进同一大学，来往得反而少了。大学所在地的汉花园和马神庙，大概与巴黎的蒙玛区差不多吧。这里不单住着北大的学生，而且住着各式各样的青年文化人。他们多数是贫苦的，孜孜向学的，思想与生活却有点放荡不羁的。油头粉面的西装少年此地极少见，常见的是手里捧着厚厚的洋装书，或握着新出版的期刊的人，他们多半蓬松头发，身上胡乱套一件蓝布大褂，足上穿着老布鞋或破布鞋。小公寓和小饭馆里，多的是这些操着南腔北调的、形形色式的小名士，小学者，艺术家，或者“乱党”。多少受过创造社浪漫主义影响的我，原本向往于这种布希米亚生活的，一旦置身实有而近乎想像的环境中，自然非常高兴了。我竭力想和他们接近，不久也结识了其中的一些。杭州第一师范里曾经相当出名的“湖畔诗社”，那时有二位主将——冯雪峰与潘训，住在这个“蒙玛区”，我认识了他们，尤其和后来瘦死于天津狱中的潘训（漠华）最合得来。文学团体此外还有不少，有出刊物的，有纯粹以研究为目的的，我对它们都怀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可是始终不曾成为任何一个社团的成员。在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两个人与我较为接近：王实味与张光人（后来的胡风）。巧得很，这两个人后来都做了中共文艺政策下的牺牲者。在教授群里，我和徐志摩有点私人关系，但无论在性格、思想或生活态度上，我都不能追随这位乡前辈之后。我喜欢读他的诗文，也欣赏他那种天真得像孩子样的心胸；可是他和研究系关系太深，如果不是自觉的，至少总是不自觉地在宣扬这个政派的思想。我讨厌他这样做。他“唯美派”的生活方式也叫我见了反胃，他在“新月社”里粉红色的寓所我只去过一次，他主编的《晨报》副刊没有投过稿。《语丝》上有我的文字，但同周作人始终不曾会过面，鲁迅也无缘相识，只和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的刘半农，有过一些文字以外的交往。

当时北京蓬勃的文艺活动，仿佛是有点反常的。“五卅”与“省港罢工”发生之后，中国革命斗争早已由思想进入行动，并且在它的前列出现了工人。革命实践甚至已越出了古典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圈子，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内容。可是在这时候，曾经是新思想运动发源地的北京，思想斗争却主要反映在或集中于文艺的小问题上。这些争论，如果与前几年由《新青年》挑起的论战相比，会显得毫无生气，若放在当时全国总斗争的背景上看，那简直是无聊得很。

我个人，以及汉花园里不少小名士们在一个时期热心于文学活动之后很快对它表示了厌倦，正是它在大时代中见得反常这一点促成的。那时候我们谁都不曾去探究那个“反常”的原因，我们只觉得再搞文学是无聊了。可是在事后回想起来，我却认为那时候北京文学活动的蓬勃却并不真正反常。或者说，那个反常是完全可以解释的。一个思想运动的前哨战和后卫战，常常采取文学方式。当这个运动达到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的高潮时，文学的声音便听不见了；这运动如果不幸而遭受了挫折或失败，形形色式的文学运动却又会应运而生。如果革命成功，文学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也会衰竭，因为有生气的文学毕竟是“不平之鸣”与“苦闷的象征”，而文学家总以自愿或被迫的“悠闲”为其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一九二六年之前的北京文学活动，一部分仍旧代表着此后革命斗争的前哨战，而在另一部分的意义，则又表示出北京那地方已由思想斗争的主战场变成为次战场，这里是以斥埃哨的零星接触来代替主力搏斗了。

使北京的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文艺运动配合到全国革命的主力战中去，应该说是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发生在执政府面前的惨案为契机。它用了四十七位男女青年的生命，以及数以百计的人所流的鲜血，给当时北京的情况以一种决定性的转变。如果说，这惨案结束了北京知识青年的一个特有的时代，那是并不夸张的。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斗争的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很不清楚。在少数的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在那个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一天”的夜里，北京青年人的悲愤是无法形容的，而在我们大学的宿舍里，最容易听到的感慨是“百无一用是书生”。鲁迅在那几天里写下不少篇精彩文章，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

“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

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就这样，“三一八惨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汹涌暗潮：要以枪杆子来代替笔杆子。

三个月之后南方因北伐开始而引起的革命斗争，像野火般蔓延开来。整个南中国的天际被烧得通红。我们从阴暗的北国遥望南天，越发见得这景色迷人，壮丽无比，因此也就越发鄙弃那琐碎无力的文学争论了。人们渴望行动，拼命追求与行动有关思想和理论。北京，这个多年来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活动中心的古都，至少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默默无声了。

与一般人的猜度相反，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北京大学里的“乱党”为数不多。最初我当然无从知道，等到我参加学校支部的领导之后，才发现一千三百名同学之中，我们的同志竟只有二三十人。据说原来还要多些，只因“五卅”之后，南方形势开展，干部需人，有不少人被指派或自动地南下。不过那时候是毋须担心人少的，由于时代的整个风尚所趋，有些年轻人正愁着不得其门而入呢。组织方面并不广开大门，争取对象相当谨慎，怕的是让投机分子大量涌进来。因此在那时的少数同志中，值得怀念的人着实多。就我记忆所及，仿佛没有一个人有幸运存活到今天因而当上显要的，但英勇成仁的烈士可就不少。至今仍温暖地活在我心头的：有与高仁山教授同时被枪决的彭树群同志（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有被蒋介石残杀的杜宏远同志（也是学数学的），有在昆明被处死的张经辰同志，以及后来惨死于日帝宪兵队里的陈其昌同志。在我们的同志中，只有当时担任支部书记的段某最不成器，一个“职业学生”型的风头主义者，从不读书，只会传达命令，能用手段，却缺乏勇气。此人当时就不很为同志们所爱戴，只因他和上级关系好，维持了他的领导地位。革命一失败，此公立即脱党，在蒋介石统治之下，一度曾任山东某县县长，以后便不知下落了。

学校支部的工作最初仅限于一校之内，主要是经过学生会来发挥影响。那时与我们作对的是属于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右翼分子，其领袖为王钟祺与傅启学等。不过他们没有群众，所以无法与我们认真抗争。学生会及所属机构都落在我们的掌握中。在我参加工作时期，因为学校里没有风潮，大学的学生会始终不曾被应用来反对任何方面的武器，我们的主要工作毋宁是在教育与训练方面，办了很好的夜校，给校工及贫民读书，同时又团聚了学校附近的一群水车夫。我们此时更重要的工作是教育自己，并在同学中选择优秀对象，争取他们入党。这工作在较远大的目光中看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种种关系，北大早已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的两大供应站之一了（另一个是上海大学）。李大钊主持的北方局很看重这个工作，支部中学习理论的会议开得非常勤。可是事情却并非进行得很满意。当时北京中共地委负责我们支部的教育工作的是陈为人，一个由法国回来的勤工俭学生。人相当可贵，吃苦耐劳，毫不浪漫，性格与汉花园里我们这一群“布希米亚人”恰巧相反。他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职业革命家”的形象。关于所谓，“铁的纪律”、“绝对服从”等等，我们是从他那里听到的。最初他给我们以新鲜感，对他怀

有应有的敬意，可是过不多久，他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他对于一般的知识和特殊的革命理论都掌握得太少，使我们感到失望。他时常来给我们做理论报告与政治报告，但显然他只是一架惯打折扣的传达机，根本不能完整地把听来的东西传给我们，甚至他自己都不甚了了，以至听者如果不懂而向他发问时，他多半只好支吾以对，有时更坏的，还会摆点架子，怪你多问。地委中的刘伯庄比他高明，但不常来。李大钊则因当时环境关系，很早就住得隐秘，我始终不曾见过他的面。

我们初步踏进了行动，但我们连起码的理论都不曾具备，这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党员是一大苦闷。北京当时很难买到社会科学的新书籍。在一九二六年年底以前，我记得我们曾经读到的仿佛只有蔡和森编的《社会进化史》。北大图书馆里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只因当时北伐军进展，北洋政府加紧反对“赤化”，那些书也不得不收藏起来，不让借阅。

理论学习上的苦闷，学生运动的单调（和南方的火热斗争相比），再加以我个人的生活濒于绝境，使我不得不作离京打算。

在北京住了一年多，经常陷在经济危机中。大哥履行他的诺言，尽可能地接济我；但他那时的情形也很狼狈，不可能按月邮寄，寄来的钱亦不定够我使用。卖文章不无小补，但仅仅小补而已，那时的稿费低得可怜，同时报馆也老是闹穷，发稿费时即使两三元都会搭上邮票或辅币。四元多钱一月的包饭，我时常没法应付。如此这般的生活拖到了一九二六年秋后，我连那件过冬御寒的袍子都放在典当里无法取出来，日子真是难于过下去了。于是我决心放弃大学生活，请求到广东去。

一九二六年深秋时节，我从海道来到了广州。那时北伐军已经达到长江流域。武汉初陷，蒋介石的重兵集结于南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都未正式北迁。名义上的革命首都仍旧是广州，但情形显然已较冷落，这里主要变成为革命的大后方，成为一个补给站了。政治上，这里的实权已落在李济深手里，那时他和蒋介石接近，属于国民党的右派。不过左派势力当然还很雄厚；省港总罢工尚在进行，总工会仍可与政府机关分庭抗礼。

这样的广州，与我在北方想像时的“革命圣地”有了不少距离；但仍能使我见了兴奋，给我以情绪上的满足。我一住定就去访问书店，像只土拨鼠跑进了阳光圈中一样，只觉得五花八门，光彩夺目，看得头昏目眩了。红色的《新青年》我第一次见，《向导》和普通刊物一样地公开陈列着，封面上用大字印着“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字样的书籍充斥柜面，使我看了又惊又喜，因为在之前，我们还是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放低了声音才敢提起这些名词的。我差不多尽我袋中所有的，同时不加选择地买了一大批回去。

这几期《新青年》（记得最近一期是“世界革命”专号）给了我极深印象。这是第一次我知道了关于革命原来有这么多又这么深的道理。从来我只有一些概念，正确些说，只有一些信念，只觉得这种口子不能再延续，这种黑暗的统治不能再让它横行，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再忍受，为此我们非革命不可，而且非彻底革命不可。我们参加共产党，主要因为它是最彻底与最革命的，此外再不明白多少了。当时的地方某些领导者们

甚至告诉我们说，根本也不需要再明白什么，有了这样的信念就够，因为革命之道首先在乎行动，在乎干，而多作研究会变成“学院派”，“学院派”就是只会说空话的。我们当时就不满意此种态度，不满意陈为人们的唯干主义。心里想，这多半是这位同志自己不学借以解嘲的理论吧，可是再过些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北方一二个干部的偏见，竟是二次革命中流行于党的一个重要倾向。看了这次的《新青年》后，我仿佛被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接触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诸如有关革命性质，社会性质，革命领导，革命中阶级关系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等，第一次闯进了我的头脑，引起我的思索，并且构成了我此后思想生活的主要命题。

杭州的旧师友中，此时有不少正在广州。有几位竟已当上了党（国民党）政方面的中上级干部，他们的生活相当好，因之我在这方面也就没有问题。临到几天，受到友人们热情的接待。广东著名的饮食都有机会尝试了。同时通过他们，我很快看见了当时革命机构的全貌。我发觉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干部，和我们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同。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与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对我有似至宝的革命书报，这儿认真阅读的人却仿佛很少；年轻人聚在一起，女人问题谈得比政治问题起劲得多；孙中山的那两句有名口号，这儿已被普遍地改为“恋爱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及其理论问题永远不会听人提及。酒食征逐与方城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恽代英的艰苦作风虽为人乐道，然从而效之者却少而又少。这种情形，愈来愈令我痛苦，因为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我想起北方同志们的清苦而严肃的工作。而最使我难过的则是此地对工作的看法已完全不同，人们将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

我那次南来，原因之一虽然是生活所迫；但解决生活毕竟不是我的主要动机。离开学校的第一原因是为的想更直接、更热烈、更有效果地参加革命。可是一到广州，人们（甚至连我的朋友在内）却以求职的人来看待我。对我有感情的人尤其使我痛苦，因为他们设法要为我“弄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也就是说，要谋一个地位较高的职位。我感到了屈辱。事实上，那时广州是“人浮于事”的。革命重心业已北移，但真诚的和投机的青年（也有中年）却继续不断地涌来。工作并非没有，只是人们大多想做“比较好的”，而好的却已为人捷足先得了。

来到广州的最初半个月，新的知识吸住了我，暂时又不愁食和住，因之不想到“职位”问题。稍后，有三个工作让我挑选：一、某军政机关的出版工作；二、军队里做党代表；三、仍回北京。

那时候参加“外部”工作（即在国民党的军政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并非全部由“内部”决定调派。许多较不重要的工作，时常由党员经人事关系谋得之后，再经组织核准。我上面所说的一二两项工作，就是朋友们（当然他们都是党员）给我介绍的。第一项工作我愿接受，但因我的一个朋友也想干，而他在这方面比我有较多经验，就让他去了。第二项工作是属于当时正在广州新建的、由严重做师长的独立师，杭州时代我的一位老师当了这一师的秘书长，我的一个老朋友范锦标同志做了该师某团的党代表。